

中国的智力回流现状与原因初探

林 琳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智力外流问题一直困扰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各个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海外人员开始选择回国创业,智力外流问题有所改变。文章根据我国智力回流的现状,通过探讨智力回流在流动方向、主体和方式上与一般劳动力流动的差别,把智力回流总结为在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将知识、技能带回国内的过程,提出了对我国出现“海归潮”现象的看法,认为大量海外人员的回国不仅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紧密相关,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产物,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

关键词 智力回流; 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C 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3-0040-05

Brief Study on Status Quo and Causes of Brain Return in China

LIN Lin

(Cen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Brain drains—loss of human capital for home countries—have been obsessing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China as the representative. However, with the fast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talents choose to return to work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brain return in China, this paper, through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ain return in mobile direction, mobile subjects and mobile style and ordinary labor force mobility, summarizes that brain retur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advanced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learn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bring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China. After summarizing the opinions about brain return,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returning wave of overseas talents"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eturning of many overseas talents to China not only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changes, but also is the produ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s tightly related to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brain return;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capital

发展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非常富裕,而有些国家却十分贫穷。从卢卡斯^[1]开始,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就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人力资本这一要素上。由此,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的“智力外流”(brain drain)现象也被

认为是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会对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未能幸免。从1978年到2002年这25年间,我国58万余人出国留学,截至目前,还有将近3/4的留学人员滞留在国外,形成了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支援(reverse aid)。但庆幸的是,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也随之出现了一股“智力回流”的浪潮。本文通过探讨智力回流在流动方向、流动主体和流动方式上与一般劳动力流动的差别,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义,并依此对我国智力回流的现状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我国智力回流的各类因素。

一、“智力回流”的内涵

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和“智力回流”,是两股方向相反的劳动力国际流动趋势。

前者指的是“穷国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种国际移民活动”^[2]。而关于后者的内涵在学术界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智力回流人员就是留学人员(在国外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在国内获得了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在国外学习或深造一年及以上的人)中的回国者。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略显粗略,没有充分考虑“智力回流”的主体界定和具体形式差别。从更一般的层面上,在对“智力回流”进行界定时,可以在“智力外流”定义的基础上,部分套用劳动力城乡流动研究中的“城乡智力回流”定义——“有知识和技能的把知识、技能带回到农村的过程”^[3],把其定义为:在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把知识、技能带回国内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3个方面:

1. 流动方向

“智力回流”特指一种从发达国家流回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流动趋势。这不仅排除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比如由于东亚各国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而日益加剧的劳动力跨国流动的现象,即所谓的南南迁移(South-South migration);而且也排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比如欧洲各国之间出于政治庇护或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劳动力跨国流动等^[4]。

2. 流动主体

“智力回流”强调的是“智力”(brain)的运动过程。虽然“智力”的载体是人,但是从本质上而言,智力仅仅指的就是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突出的能力。而事实上,我国的大部分留学人员通常都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后,又通过留学等方式在国外接受继续深造,学习掌握最前沿的各科知识和技术。这些智力

载体的存在为“智力回流”的出现储备了充足的智力资源。

3. 流动方式

笔者之所以认为上文提到的部分学者对“智力回流”的定义有粗略之嫌,一方面是因为其混淆了流动载体与流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其忽略了流动的多样性。从实际情况看,“智力回流”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留学回国人员这种流动载体的回流外,笔者更强调“智力”这一流动主体本身的内流,并将“智力回流”的流动方式归结为三类:一是“人回智力回”,这类人群可以说就是上文提到的留学人员中的回国者,国人也常把其叫做“海归”。他们不仅回到国内,而且决定长期居住、工作在国内。二是“候鸟型”回流,这部分人群拥有外国国籍,但每年会有一定的时间飞回国内进行学术交流、创业经商或考察咨询;第三类“智力回流”人群是“人不回智力回”。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很多海外学者无须通过亲自回国,就能将他们在国外接受的最新科学技术与知识与国内同行们分享^[5]。虽然这种“智力回流”,并没有实现居民身份意义上的回流,但是它同样把“智力回流”中最重要的流动实体——知识和技能带回了国内。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智力回流”,其实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知识产生外溢效应的一种体现。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分享全球知识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

二、中国“智力回流”的现状

根据上文所述,“智力回流”有三种不同的流动方式。其中以第一种“人回智力回”的流动形式最具代表性。而且由于“智力”指标在测量上的难度,以及我国相关部门对于各种回流智力的统计资料缺失,本文对中国“智力回流”的现状分析主要是针对第一种回流方式。

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我国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我国的智力回流人数逐年递增(见图1)。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人数逐年增加。其中,2003年度,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01万人,这也是自1978年以来,我国年度留学回国人数首次突破2万人。随后几年间,2004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5万人,比

2003 年增长了 24.6%；2005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 3.5 万人，增幅高达 39.4%。2006 年度，这一数字更是突破 4 万人，达到 4.2 万人，同比增长 21.3%。而 2007 年虽然回流人数达到 4.45 万，比 2003 年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多，但同比增幅却出现较大回落，仅增长 4.79%。据分析，出现这种增长回落的原因在于，海外人才回流的时滞性。因为由于 2003 年 SARS 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那两年的智力外流人数出现下降趋势，而 2007 年以及之后几年正是这批人才结束海外学习的时间段，因此回流的智力人数难免会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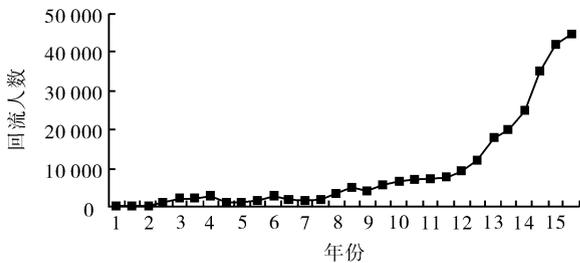


图 1 1978—2007 年中国人才回流情况

1. 1978; 2. 1980; 3. 1982; 4. 1984; 5. 1986; 6. 1988; 7. 1990; 8. 1992; 9. 1994; 10. 1996; 11. 1998; 12. 2000; 13. 2002; 14. 2004; 15. 200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2000—2008 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回流人员的组成来看，公派留学人员的回流率是最高的。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截至 2005 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 22 031 人，到期应回国 18 654 人，已有 18 098 人按期学成回国，回归率为 97.02%。而自费留学人员的回归情况则在这几十年间有巨大的变化。在 1997 年前自费留学人员的回归率非常低，只有 2.3%。但可喜的是，这几年来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的逐渐递增，从 2003—2007 年，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由 1.32 万人增长至 3.6 万人，增长了 2.7 倍。

三、中国“智力回流”的原因

面对国外优裕的经济条件、丰富的生活环境以及完善的工作配套设施，海外人员为何会选择回国？又为什么会选择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祖国服务？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的。而关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理论，最早则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著名的“迁移法则”^[6]，该法则揭示了距离、性别、居民身

份等各种因素与迁移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后来的“推”“拉”理论，则更详尽地阐述了迁出国和迁入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原因如何影响行为人的迁移行为。当然不同的分析方法会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流动现象。

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差别迁移，即流动人口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人群中，不同的动机对应着不同的迁移群体，如迁移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选择性。经济学家同样在此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学框架中，个人的效用最大化总是被作为决策的执行标准。因此迁出地与迁入地所能给个人带来的效用差就成为个人迁移的最终动机^[7]。

而在分析中国的“智力回流”问题时，我们当然不能回避这些行为出于自利而追求更好生活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国外更高的收入、更优裕的生活环境确实很容易成为这些海外人才的理性选择对象。但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绝对的收入差距使得单一的成本—收益分析很难对目前大量的“智力回流”现象作出有力的解释。因此我们更应该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各方面找出更深层的原因^[8]。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是这些回流“智力”的定心丸。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在 1950 年到 1980 年间，有 80 000 名大学毕业生离台前往国外学习。但是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层次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日益明显，从那以后，学成回岛的人数开始增加。1980—1989 年间，从国外回到台湾的学者、住家以及新近完成学位的留学生，一共有 14 882 人；而 1990—1995 年间这个数目增加到 30 238 人。他们分别占同一时期台湾岛内所有高等学校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的 4.4% 和 55.1%^[9]。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韩国。反观中国大陆的情况（见图 2），中国的 GDP 增长在 1998 年左右出现拐点，之后呈递增的趋势不断发展；而海外留学人员的回流数量则是在之后的两年内出现了转折点，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可见，健康快速发展的经济给这些海外人才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也提供了大量的致富机会，吸引他们回国进行投资创业。另外政治稳定也是海外人才回流的一个重要保障。而今我国政治稳定，学术氛围较为自由，这也为回流的人才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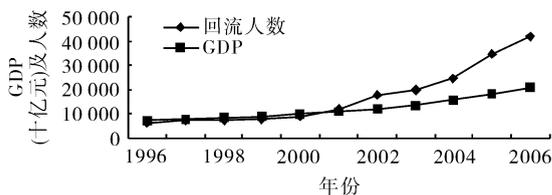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1996—2006年的GDP增长与智力回流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其次,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是“智力回流”的“拉力”。政府提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要着力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就是要在一些重要产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这就对我国的人力资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9]。

自90年代以来,一批积累了先进高科技、现代化管理知识和跨国营运工作经验的中国留学人员,纷纷踏上归国之途,尤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将归国创业作为首选。他们的回国推动了国内新经济、新技术、IT、传媒等诸多新产业的发展,比如UT斯达康、搜狐、新浪、亚信、中星微电子、当当、e龙、携程、百度、盛大、物美等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另外,产业结构转型期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这方面国内人才的稀缺也为海外学子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包括了创业型人才、职业经理人、金融财务人才、咨询人才、法律人才、经纪代理人才和IT和网络人才、传媒及出版人才、公关和广告人才等各界人士。大量的海归精英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领跑者,加快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再者,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加快了我国的“智力回流”。从世界经济史中经历的几次生产要素大流动的情形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总是与物质资本保持一致的流动方向。中国这几年经济建设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确实吸引了不少世界的目光。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1998年之后呈现连年攀升的趋势(见图3)。而这个时期也正是我国海外人才开始逐步回流的开始。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外资的性质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的行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也曾在公共场合透露,联合

国贸发会议最近对世界上在研发方面支出最大的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69%的跨国公司预计在外国的研发份额将上升。中国是这些公司最常谈到的研发扩张目的地^[10]。而我国在海外留学的人才所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所了解的管理技能都是这些行业与部门所急需的,也使这些资金能够更好地得到配置。可见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使得两者呈现相同的流动方向成为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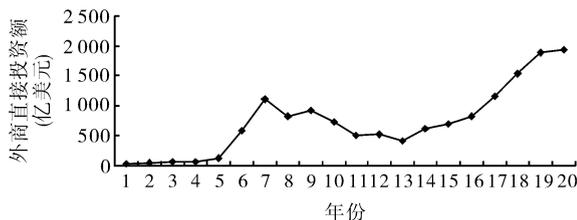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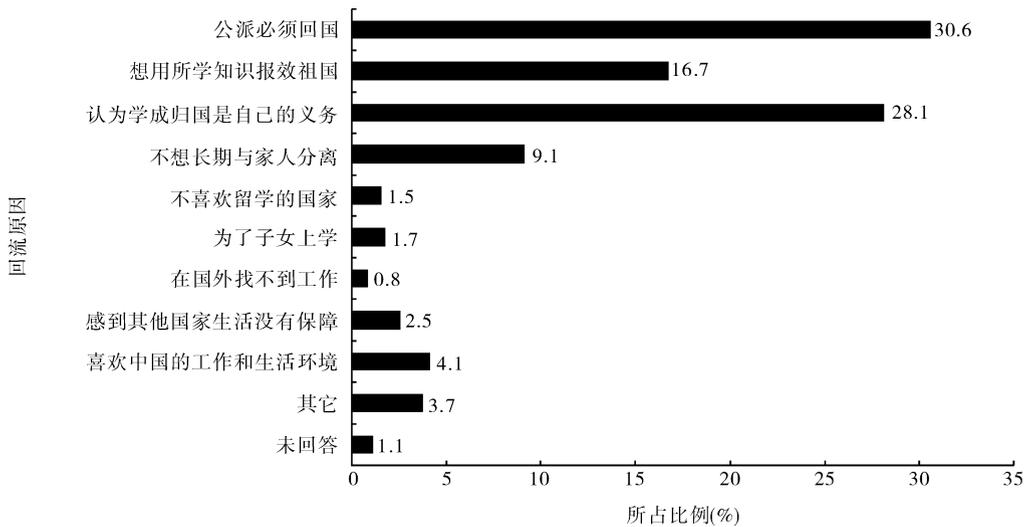


图3 1990—2004年我国的FDI(外商直接投资额)

1. 1987; 2. 1988; 3. 1989; 4. 1990; 5. 1991; 6. 1992; 7. 1993; 8. 1994; 9. 1995; 10. 1996; 11. 1997; 12. 1998; 13. 1999; 14. 2000; 15. 2001; 16. 2002; 17. 2003; 18. 2004; 19. 2005; 20. 20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最后,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在分析“智力回流”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在这些人群的行为决策中的作用。第一、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一直是中国人从小就受到的思想教育,因此很多海外人才在学成之后,都有为国作贡献的决心和意愿。在王震宇^[11]对1044位海外归国人士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将回国的原因归于爱国心的占到48.9%(想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的16.7%加上认为学成归国是自己的义务的28.1%,再加上喜欢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4.1%),可见有近一半的人都是因为主观上对祖国的感情而选择“回流”。第二,中国一直是个很重视家庭伦理的国家,因此家庭因素同样会影响海外人才的去留。格雷泽^[12]和伊尔萨迪^[13]的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可以决定哪些人会选择移民,哪些人会留在国外,又有哪些人会选择回流。在大卫茨威格教授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中,家庭为工人、农民出身的调查者中分别有32%和28%的人选择回国。而从王震宇的研究中(见图4),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所有归国原因中有10.8%(不愿长期与家人分离、为了子女上学)是和家庭因素有关。可见,仅用个人效用为基础的分析显然不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

图 4 归国的主要原因^[11]

实,一个社会文化对个人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法所无法衡量的。

参 考 文 献

- [1] 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 [2]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山西: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 227-229.
- [3] 潘晨光, 娄伟. 中国农村智力回流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5): 60-65.
- [4] BORJAS, GEORGE J. 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4): 531-533.
- [5] CHEN YUN-CHUNG. The limit of brain-circulation: Chinese returne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 [EB/OL]. [2008-04-27]. <http://www.cctr.ust.hk/articles/pdf/WorkingPaper15.pdf>.
- [6] RAVEN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5, 48(2): 207-215.
- [7] WONG K Y, YIP C K. Educ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brain drain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9 (23): 699-726.
- [8] DAVID Z.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politics vs. economics in China's brain drain [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7, 32(1): 92-125.
- [9] SAXENIAN A, HSU J Y.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10(4): 893-920.
- [10] 王舒. 联合国: 中国是研发领域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扩张地 [EB/OL]. (2005-09-09) [2008-05-14]. <http://gb.cri.cn/3821/2005/09/09/1566@693434.html>.
- [11] 王震宇. 归国留学人员留学印象, 职业流动与工作成就研究 [M]. 东京: 筑波大学出版社, 1997.
- [12] GLAESER E L, SCHEINKMAN J A, SHLEIFER A.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5. (36): 117-143.
- [13] EL-SAATI S. Egyptian Brain Drain: Its Size, Dynamics, and Dimensions [M]. Cairo: Ari Shams University Press, 1979.

(责任编辑: 陈万红)